

# 第2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冯 强

2021年10月16—17日,第2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新时代需要新史学,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自全国50余家高校、科研机构、杂志社及出版社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研讨会以“百年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为主题,在大会主题发言之外,还以分论坛形式进行深入研讨。分论坛主要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四个方面议题展开。研讨会学术互动频繁、气氛热烈,为探索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共谱新篇章,共倡新征程。

## 一、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新探索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历史学亟需探索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指出,要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统领历史研究;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告别对西方学术的“模仿”和“跟跑”;新时期的历史学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指出,三大体系建设是当前历史学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关键在于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史学,学界需要在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构建、处理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对关系等方面着力;这需要整个史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更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

在主题发言中,其他与会专家也分别从各自专业领域,为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献策献计。吴晓群(复旦大学)提出,把“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视为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主要研究场域、问题意识、考察视角及方法论上的一种转向。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结合,涉及两个维度:历史过程维度及其所生成的思想维度;两者结合既确保了史学史的严谨与考究,又兼具思想史的丰赡与深刻,能够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带来某种突破和创新。孙竞昊(华东师范大学)指出,“西方中心论”源于近代以来欧美领先世界发展的霸权角色和话语,各种“本土化”诉求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更应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相互观察比较的参照系。钱茂伟(宁波大学)指出,口述史的最大获益群体是大众,浩如烟海的口述史能让史学成为服务全体人民的学科;公众口述历史让公众与历史无缝接轨,他倡议建立一门全新的公众口述史。黄兴球(广西师范大学)指出,中越史观分歧是深层影响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认知问题,这对中越两国开展历史对话提出了重要的现实要求。

与会专家的成果展现了新时代历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王旭东(世界历史研究

所)指出,信息史学旨在清除不同学科话语体系之间的藩篱,营建能够将历史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跨学科语境,构筑基于21世纪新科学研究范式的新史学,以促进我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现代化。张旭鹏(历史理论研究所)论述了观念的空间特性和观念的跨时空旅行,揭示了观念和空间的混杂性,并且指出空间是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研究观念与空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收获更多创造性潜能。徐毅(广西师范大学)指出,各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大分流”研究成为英语世界全球历史领域的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英语世界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经验的关注与重新评价。赵庆云(历史理论研究所)围绕《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撰著和影响,分析了胡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陈安民(西南大学)指出,西方社会对于历史价值与史学功用的讨论,深受族群利益、政治态度、宗教立场、舆论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学术性、社会性、历史性、多元性的交织。这些观点体现了与会专家各自关注的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及成果,是对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本届研讨会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与会学者的讨论重点。黄令坦(中南大学)探讨了毛泽东史学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认为毛泽东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和历史风格。王郝维(华东师范大学)从《毛泽东选集》一处改动说起,探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的争论。戚裴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出现与当时的政局、社会发展情况紧密相关,持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者同其他学派学者展开论战,其中一项重要议题是民族问题。张道奎(山东大学)论述了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跨学科构建的初步尝试。王利红(北京联合大学)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从“存在论视域”来审视世界历史,存在论视域是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视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相关研讨论文无论是在纵向时间跨度还是问题侧重点上都凸显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特点。王兴(中国人民大学)探讨了考古学家夏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问题。夏鼐不但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决专业学术问题,在实践中提高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理论水平。邱亚(湖南师范大学)分析了张舜徽对人民史观的接受与运用。张舜徽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由崇尚英雄史观转向信守人民史观,至今仍给后学重要启示。陈伟扬(广西师范大学)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共历史学者在桂林的史学研究及教育活动。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及进步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桂林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和出版中国近代史通史教材。张杰(中国国家博物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与运用,这些研究实践推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

郭沫若等代表性人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程鹏宇(忻州师范学院)以陶希圣、郭沫若、侯外庐为例,论述了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转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定型。王舒琳(中国地质大学)探析了郭沫若的“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论断,这与郭沫若的中西文化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宗旨的理解等内容密切相关。王慧颖(历史理论研究所)探讨

了20世纪50年代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研究,认为胡庆钧的学术转型折射了彝族社会研究的路径转变;挖掘胡庆钧凉山彝族社会研究与郭沫若之间的联系,可以捕捉古史分期讨论在史学之外的余响。何刚(乐山师范学院)通过以《中原》杂志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郭沫若与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的营构;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以《中原》杂志为纽带平台,形成了学术潮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进展。任虎(华东师范大学)探讨了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联系,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历史特殊性,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 三、中国古代史学

中国古代史学的相关讨论纵贯中国古代史的漫长时期,明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廉敏(历史理论研究所)提出要在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之间架起史学理论的桥梁。通过考察历来关于王守仁平濂一事之记载及其变化,廉敏认为其中有规可循,关于王守仁平濂一事还有诸多问题有待重新认识。史大丰(枣庄学院)认为,蒋棻《明史纪事》在叙事中运用历史镜像比较法,反映了明末清初史学中的历史比较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末清初私修明史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的思潮与特点。梁曼容(延安大学)结合明代宗藩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相关理论、方法、视域和内容进行总结与评析,强调其中问题意识之不同。常文相(历史理论研究所)通过对明代商人、商业研究中的中国历史演进道路的省思,探讨了传统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指出今后研究应注重强化文明比较和结构分析视角,为自主创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不懈努力。

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品和关键概念,受到与会多位学者的重点关注。胡楚清(历史理论研究所)比较了李焘与李纲史论之不同理论路径,认为二者都是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的历史理论资产。汤莹(山东大学)论述了顾颉刚“古史地域非向来一统论”,指出顾颉刚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对中国上古疆域沿革进行了系统考察与分析,推进了中国疆域沿革研究的近代过渡与转型。董家宁(历史理论研究所)辨析了“天下”“海内”概念,指出“天下”与“海内”共同构成了时人认知中的大一统政治空间,理解“天下”“海内”概念的文化意蕴,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历史的理解。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中古时期人们通过抄书获取知识,并以新方式生产新知识,类书以追求知识的来源和数量广泛为目的,打破了知识的边界;抄书形成的节略本较原本更富传播优势。韦勇强(广西师范大学)论述了《崔东壁遗书》对我国近现代疑古派学者的影响。《崔东壁遗书》由日本学者推介重新引起学界关注,梳理《崔东壁遗书》与近代疑古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评判该书的历史地位,并分析近代疑古史学发展的理路。上述中国古代史学研究问题意识强烈,有助于历史研究突破壁垒和达成共识,是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角度回应新时代历史学的理论呼声。

### 四、中国近现代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最近几年一直是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重要内容。高春花(牡丹江师范学院)指出,结合时任聂士成武卫左军统领杨慕时、总文案汪声玲、士兵苏锡麟及裕禄幕府林学诚留存资料,辅以诗文记载及史料笔记、外国亲历事件者的日记、回忆等资料,可以更客观地评价庚子事

变时期的聂士成。渠桂萍(华南师范大学)基于布罗代尔“局势”理论,探析了晚清会党速增的原因,集中讨论了影响会党急剧壮大的“中时段”原因;认为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给会党研究提供了“整体史”视野。刘劲松和张泽阳(江西师范大学)考察了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问题;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的重要地位,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评判标准,而在史料扩充上有分歧。何鑫(南京大学)探讨了萧一山清史叙述范式的转变问题,萧一山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接受、时局的变化、个人经历等因素均促成其民族革命史观的形成,并在《清史大纲》中完整呈现。

李长银(山东大学)探讨了康有为的今文家言与“古史辨运动”的历史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承接康有为的今文学体系,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张西堂、罗根泽的研究都受益于康有为的相关论述。罗萍和冯吉(三峡大学)指出,企业档案识读是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说明了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范式从革命史观到西方中心的现代化史观、再到多中心互动现代化史观的动态转换。何立波(北京师范大学)分析了雷海宗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播和研究,雷海宗对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较早批驳了“欧洲中心论”,反对“中国文化消亡论”,彰显了中国文化自信。杨钊(北京外国语大学)探讨了皮名举的博士论文与民国时期的外交史研究,皮名举博士论文聚焦晚清时期重要的胶州湾事件,在史料和观点上有很大的突破,为民国时期外交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展钊(海南师范大学)以学人相关评述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国东南亚研究中利用“他者”塑造“自我”与所谓“中不如西”观点的复杂纠缠,这是民国时期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真实写照。王霞(天津师范大学)从人文与科技的视域融合出发,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通史中“科技史”的构建及其史学意义,科技史为现代学术提供了丰富的科技史料,推动了人文与科技的视域融合。刘承军(山东师范大学)通过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学派”学术话语的考察,指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理念、治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成为民国时期主流的学术话语,并引导了学术潮流的发展。李兵(苏州大学)探讨了跨领域社会流动的研究范式与方向,历史学家将社会学范畴的社会流动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之后,对科举制度是否带来社会流动产生了争论。

吴海峰(西北大学)探讨了杜维运史学思想的捍卫传统与走向现代的两个特点,重新审视杜维运史学,能够为传统史学的更新和中国史学更好地走向全球舞台提供历久弥新的学术与现实参照。韩博韬(山东大学)论述了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构建及其意义,认为姚洋以“实用理性”为基础提出的“中国务实主义”更具正向的价值。冯立(历史理论研究所)对30年来影像史学研究对象的演进开展了基于概念史的分析,随着信息化技术媒介的不断革新,历史的记录逐渐从文字记述向影像记录转变。李恒(河南大学)基于《史学月刊》的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史学研究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实证与叙事史学回归、互联网与数据库的推动、中华文明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等重要问题,推动了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发展。

苏泽龙(山西大学)指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地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具有丰富“地方性知识”的内容。申慧青(河北大学)基于杜维运、严耕望、赵光贤和漆侠的四本代表性著述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求同存异”的史学研究趋向。王锐(华东师范大学)认为林毓生将分析重点转向中国近代思想史,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思潮与现代中国的“乌托邦”实践相联系,形成了一套极具影响的历史叙事。李席(广西师范大学)梳理了晚清民国的历史理论探索,认为历史认识和历史专业的发展仍需要在学科自律和学科开放等方面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与会学者及论文,展现了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队伍的有生力量及发展潜力。

## 五、中国世界历史学

世界史是历史学的一级学科,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是新时代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本次研讨会上,世界史学者通过世界视野、中国立场,展现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独具特色的发展趋势。吕厚量(世界历史研究所)分析了英国罗马史学家罗纳德·塞姆与20世纪中期的塔西佗研究,《塔西佗》代表塞姆学术生涯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必读参考书。李海峰(华东师范大学)围绕史学著作、王表、编年史或年代记、国王铭文、年名、官方书信等内容,指出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具有类型丰富多样的史学素材和史学作品。邓锐(陕西师范大学)论述了古希腊“历史认识”的原初内在状态与最初外在化转变,“历史认识”失去“内在状态”,而不自觉地以语言文字叙述为基础的“外在化形态”存在有其历史渊源。陈国保(广西师范大学)和曾鸣(云南大学)通过以《安南志原》为中心的考察,论述了中国史籍在越南的流传及其对越南史学编撰的影响。《安南志原》因其所保存的越南古代史料和明代“郡县安南”史料而具有特殊价值,在越南倍受重视,对越南的史书编撰及其历史书写产生了深刻影响。

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国别和区域研究,受到与会学者的重点关注。吕杰(安徽财经大学)通过探讨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与《近代中国》创刊的争议来阐述“中国中心观”,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提出的作为研究范式的“中国中心观”,在赞同和批判中不断获得更新的解释。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综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彼得改革前俄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方面的主要成就,梳理了中国学者对基辅罗斯、蒙古统治罗斯、莫斯科罗斯历史探索的主题及观点。翟韬(首都师范大学)考察了美国对外宣传史研究的四种视角及其“范式转移”,前三种范式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史的范式,最后一种范式并不完全是政治产物,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四种范式可以共存。丁何昕子(首都师范大学)探讨了20世纪70—90年代冷战史“后修正派”研究范式演变,冷战史研究中“后修正派”的“共识”观点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研究范式。

张一博(历史理论研究所)探讨了浪漫主义思潮下哥廷根学派的史学研究,关于哥廷根学派的传统认识是在传统历史主义史学影响下构建的产物,从浪漫主义的视角出发,会看到思想个体与多面性,进而揭示近代德意志史学家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柏悦(西北大学)指出,一批被称为“新兰克学派”的史学家在威廉二世时代成为德国史学的新力量,新兰克学派维护了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张晶晶(复旦大学)指出,在公共历史的史学书写中,医学知识、权力与道德话语的关系仍在被学者们不断地重塑,意图呈现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杨晶晶(北京大学)认为,维科在《新科学》中,通过自身建立“新科学”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统一融合,《新科学》可以看作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滥觞。

魏涛(世界历史研究所)指出,大西洋史学兴起和发展成为西方史学史的一个新分支,考察大西洋史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它的研究方法、发展现状及影响,有助于突破传统的帝国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黄畅(历史理论研究所)通过梳理约鲁巴民族的发展过程,总结约鲁巴兰在史料、历史书写等方面的特征,探讨了非洲约鲁巴兰史学;约鲁巴兰史学家通过唤醒本民族的历史意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了民族主体性,是史学对民族构建的重要实践。倪凯(聊城大学)以“观念”“理论”与“叙事”为关键词,梳理了西方史前史研究,史前史的确立与发展伴随着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

古学、历史学及遗传学的发展 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刘志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探讨了西方情感史研究的现代性路径,这种路径强调工业化、消费主义、城市化和人口变迁等现代性因素对人们情感变迁的影响。

历史叙事研究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张立芹(安徽艺术学院)在比较视野下考察了“叙事”的词语使用和理论内涵,认为中西史学话语体系中“叙事”背后的理论内涵大异其趣。冯强(广西师范大学)通过引入杰拉德·普林斯的故事学说,尝试以一种“故事”的视角对史学进行反思,故事整合了史实结构与联结,史学内有故事意涵。苏萌(河南大学)从概念差异、思想异同与学术史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叙事概念差异凸显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冯帅(吉林大学)探讨了后现代史学语境下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的书写问题,记忆研究凭借对历史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突破,对历史研究具有显著的补益价值。

世界史研究的理论进展,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新现象。王佩良(上海外国语大学)探讨了21世纪以来日本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转向,这对于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及现实借鉴意义。王郢(武汉大学)以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为样本,考察了历史语言叙述与历史认知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牛牧晨(北京大学)探讨了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理论及其内在困境,“历史表现”理论沟通文本与实在的困境在于自身的理论基础与预设。张羽丰(南京大学)探讨了作为视角的历史结构分析问题,在历史结构分析的视野中,结构是非实体性的存在,具有积淀性、生成性和解放性特点。可以看出,在本次研讨会中,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为新时代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新探索贡献了诸多域外经验。

## 结 语

本届研讨会是一次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盛会。会议既考验了主办方和承办方的筹备组织能力,更体现了全国史学工作者对新时代历史学研究的热情与责任感。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左玉河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全面和高度的肯定,认为本次研讨会论文整体上达到较高学术水平,评议点评更是精彩纷呈。他提出要切实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构建新时代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倡议学者们主动担当这一重要使命。概观本届史学理论研讨会,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势,令人鼓舞。与会学者为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课题贡献了学术力量,这是在切实践行史学工作者的主体之责,是对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初心使命的坚持和不断发展。

(作者冯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邮编:541001)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张旭鹏)